

# 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阶层差异

李 凯<sup>1</sup> 徐 艳<sup>2</sup> 杨沈龙<sup>3</sup> 郭永玉<sup>\*1</sup>

(<sup>1</sup>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sup>2</sup> 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武汉, 430079)

(<sup>3</sup>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西安, 710049)

**摘 要** 为考察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意向影响的阶层差异, 本研究基于集群行为的双加工模型, 通过操纵群体愤怒情绪和社会阶层, 测量被试参与集群行为的意向。结果发现: 群体愤怒情况下, 较高社会阶层者偏向采取规范的集群行为, 相反, 较低社会阶层者偏向采用非规范的集群行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 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类型是影响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社会阶层 集群行为意向 群体愤怒 集群行为类型

## 1 前言

集群行为是指群体成员为改善群体现状而参与的行动(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 集群行为可按照是否得到社会主管机关的许可划分为规范的集群行为(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与非规范的集群行为(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其中前者如游行示威、请愿等符合体制规则的行为; 而后者则是指破坏现行规则的行为, 其目的是打破现行的规则和体制, 如打、砸、抢、放火等破坏性行为(Tausch et al., 2011; Wright et al., 1990)。两种类型集群行为的发生机制存在明显的差异(殷融, 张菲菲, 2015), 如群体的效能感高的时候, 可能诱发规范的集群行为, 而效能感低的时候, 则诱发非规范的集群行为(Tausch et al., 2011)。近年来, 一些研究又发现, 当人们产生愤怒时, 是否参与集群行为, 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也有很大关系(Fritzsche et al., 2017)。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一种用来反映个体在社会层级阶梯中相对位置高低的社会分类, 一个人的社会阶层代表了他(她)所占有的客观社会资源, 以及其主观上所感知到的自身社会地位(胡小勇, 李静, 芦学璋, 郭永玉, 2014; Kraus, Piff, Mendoza-Denton, Rheinschmidt, & Keltner, 2012; Kraus, Tan, & Tannenbaum, 2013)。但社会阶层究竟对集群行为的产生有何影响, 尚未得到实证研究的探讨。

本研究探讨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类型对群体愤

怒与集群行为意向关系的调节作用, 分析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意向的阶层差异。对此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关系的边界条件, 还有助于理解为何不同社会阶层在参与集群行为的意向上会存在差异, 即理解高低社会阶层参与集群行为存在差异的机制。

### 1.1 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的影响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群体愤怒(group-based anger)是诱发民众参与集群行为的重要因素(Smith & Huo, 2014)。群体愤怒是指群体成员基于自己群体成员身份对群体所遇到的问题进行评价后而产生的一种愤怒情绪(van Zomeren, Spears, Fischer, & Leach, 2004)。群体愤怒历来都是集群行为研究的重要变量(Tausch & Becker, 2013; 张书维, 2013)。以往大量研究都发现了群体愤怒的确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人们参与集群行为(或意向)(孙静, 2013; van Zomeren et al., 2004), 对集群行为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动员作用(Shepherd, Spears, & Manstead, 2013; Tausch & Becker, 2013)。由此, 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H1): 群体愤怒正向预测集群行为意向。

### 1.2 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类型的调节作用

根据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群体所能动员的资源是集群行为能否发生的关键(McCarthy & Zald, 1977)。人们不参与集群行为, 是人们认为他们的群体太过弱小而无法

\* 通讯作者: 郭永玉。E-mail: yyguo@nj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80429

发动改变社会的行为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高社会阶层者通过现行制度获取的财富远高于低社会阶层者 (Bullock, 2017)，其效能感及所能动员的资源会明显高于低社会阶层者。这样，在群体愤怒的情况下，高社会阶层者似乎会更多地参与集群行为。一些研究也发现，与劳工群体、无职业者等低社会阶层相比，那些具有中高社会阶层背景的人，更可能参与集群行为 (Paulsen, 1991)，而较低社会阶层者则不愿意参与 (Becker, Kraus, & Rheinschmidt-Same, 2017)。由此，社会阶层可能会调节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的关系。

在相对剥夺理论和资源动员理论各自强调影响集群行为的情绪和效能因素的基础上，van Zomeren 等人 (2004) 尝试提出了一个能够对集群行为的若干理论 (包括相对剥夺理论及资源动员理论) 进行整合的理论模型，即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 (dual pathway model)，根据这一模型，集群行为发生的心理机制包括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两条路径，其中，群体愤怒可视作诱发集群行为的前提，而群体所能动员的资源或群体的效能感，则是影响集群行为能否发生以及如何发生的关键，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共同作用于集群行为。另外，根据此理论，研究者发现，集群行为的类型也会对集群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Shi, Hao, Saeri, & Cui, 2014)，因为群体效能较低时，人们参与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就较低，而可能参与非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较高。如与较高社会阶层者相比，较低社会阶层者由于其效能感更低，更可能采取极端的方式应对不公平事件 (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 Scheepers, Spears, Doosje, & Manstead, 2006)。由此分析，集群行为的类型会影响社会阶层对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的调节作用，于是，我们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 (H2)：社会阶层对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受到集群行为类型的影响。具体来说，社会阶层对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调节作用会因集群行为类型的不同而不同，若集群行为是规范的方式，则社会阶层正向调节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若集群行为是非规范的方式，则社会阶层负向调节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

## 2 方法

### 2.1 被试

招募 142 名社会人士参加本次研究，有 12 名被

试未完成实验，将其数据剔除，剩下 130 名被试，其中，男性 62 名 ( $M_{age} = 27.90$  岁,  $SD = 6.56$  岁)，女性 68 名 ( $M_{age} = 26.75$  岁,  $SD = 5.04$  岁)。

### 2.2 研究过程

采用 2 (群体愤怒：启动组、对照组)  $\times$  2 (社会阶层：高、低)  $\times$  2 (集群行为类型：规范、不规范) 混合设计，其中，群体愤怒与社会阶层为被试间变量，集群行为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量为集群行为意向。

首先，操纵被试的主观阶层。参考 Greitemeyer 和 Sagioglou (2016) 的操作范式，启动较高社会阶层的被试 (64 名) 阅读描述低社会阶层群体的状况 (生活在城市边缘或者农村，几乎没有收入、没有接受过教育并且没有固定职业，在生活中，很少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和尊敬)；启动较低社会阶层的被试 (66 名) 阅读描述高社会阶层群体的状况 (生活在城市中心，有较高的收入、较高的学历和体面的职业，在生活中，常常能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和尊敬)。再让被试想象自己家庭与所阅读的家庭的生活状况的对比，之后，观看 MacArthur 10 级的阶梯 (从低到高代表了社会阶层的从低到高)，并在阶梯量表上进行标记。

其次，启动被试的群体愤怒情绪。具体程序为：请被试按照所给材料想象是自家面临房屋被拆迁的情境，考虑拆迁部门所提供的补贴方案给自己带来的感受。高群体愤怒启动组 (63 名) 所阅读的材料为：拆迁的经济补偿和后期安置都没有到位，并且遭到了动迁办的暴力拆迁。对照组 (67 名) 所阅读的材料为：拆迁的经济补偿和后期安置都符合规章制度，拆迁进程比较顺利。接下来测量被试的群体愤怒水平，共三个题目 (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12;  $\alpha = .95$ )，如“作为该村的村民，面对此次拆迁的事件，您感到……”。选项从“1 一点也不生气”到“7 极其气愤”，分值越高表示群体愤怒水平越高。

最后，集群行为类型分为规范的集群行为和非规范的集群行为两个水平，在这两个水平下分别测量被试参与这两种集群行为的意向，其中集群行为类型即自变量 (被试内)，集群行为意向作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其中规范的集群行为类型包括三个题目，分别是给政府官方在线留言、网上填写关于“拆迁态度测量”的调查问卷以及转发“呼吁政府规范拆迁程序”的信息 ( $\alpha = .75$ )，将三种意向分数求平

均得到此水平下的因变量分数；非规范的集群行为类型包括三个，分别是静坐、游行示威和设置路障( $\alpha = .93$ )，将三种意向分数求平均得到此水平下的因变量分数。问卷采用7级计分方式，从“1”到“7”分别代表了最不愿意到最愿意。

### 3 结果

首先，对社会阶层、群体愤怒的操纵效应进行检验。对接受社会阶层操纵的两组被试的社会阶层得分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启动高社会阶层组得分显著高于启动低社会阶层组 ( $M_{高} = 4.16$ ,  $SD = 1.51$ ,  $M_{低} = 3.55$ ,  $SD = 1.55$ ,  $t(128) = -2.28$ ,  $p < .05$ ,  $d = .26$ )，证明该实验操纵有效。同样，对群体愤怒情绪操纵的检验结果也显示高群体愤怒情绪启动组的群体愤怒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 $M_{愤怒组} = 19.59$ ,  $SD = 2.47$ ,  $M_{对照组} = 12.90$ ,  $SD = 5.41$ ,  $t(128) = -8.98$ ,  $p < .001$ ,  $d = .38$ )，证明该实验操纵有效。

对集群行为的意向进行三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群体愤怒、社会阶层与集群行为类型三者交互作用显著 ( $F(1, 126) = 20.72$ ,  $p < .001$ , 偏  $\eta^2 = .141$ )，假设 2 得到了验证。根据研究目的，对这一交互作用进行分解分析，考虑集群行为类型对群体愤怒与社会阶层两者作用的影响。

以规范的集群行为意向为因变量，群体愤怒以及社会阶层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发现，群体愤怒与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显著 ( $F(1, 126) = 12.81$ ,  $p < .001$ , 偏  $\eta^2 = .092$ )。接下来对这一结果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较高社会阶层而言，对照组和愤怒情绪启动组在规范的集群行为意向上的得分差异显著 ( $M_{对照组} = 7.13$ ,  $SD = 1.33$ ,  $M_{愤怒组} = 12.03$ ,  $SD = 5.47$ ,  $F(1, 126) = 40.31$ ,  $p < .001$ )，此结果支持了假设 1。对较低社会阶层而言，对照组和愤怒情绪启动组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 $M_{对照组} = 6.30$ ,  $SD = 1.39$ ,  $M_{愤怒组} = 7.31$ ,  $SD = 1.75$ ,  $F(1, 126) = 1.76$ ,  $p > .05$ )。

以非规范的集群行为意向为因变量，群体愤怒以及社会阶层为自变量，进行两因素方差分析，群体愤怒与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显著 ( $F(1, 126) = 8.16$ ,  $p < .05$ , 偏  $\eta^2 = .061$ )。接下来对这一结果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对较低社会阶层而言，对照组和愤怒情绪启动组在集群行为意向上的得分差异显著 ( $M_{对照组} = 8.00$ ,  $SD = 3.86$ ,  $M_{愤怒组} = 12.00$ ,  $SD = 5.32$ ,  $F(1, 126) = 17.88$ ,  $p < .01$ )，此结果也支持了假设 1。对较高社会阶层而言，对照组和愤怒情绪启动组的得分

差异是不显著的 ( $M_{对照组} = 6.90$ ,  $SD = 2.89$ ,  $M_{愤怒组} = 7.05$ ,  $SD = 2.81$ ,  $F(1, 126) = .03$ ,  $p > .0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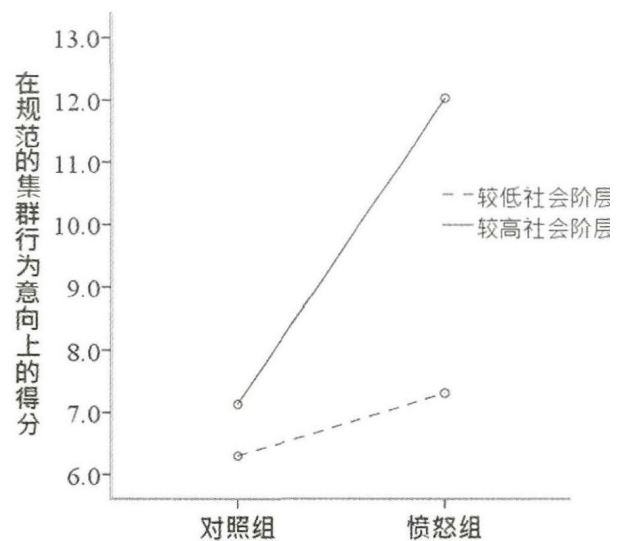


图 1 在规范的集群行为上的交互作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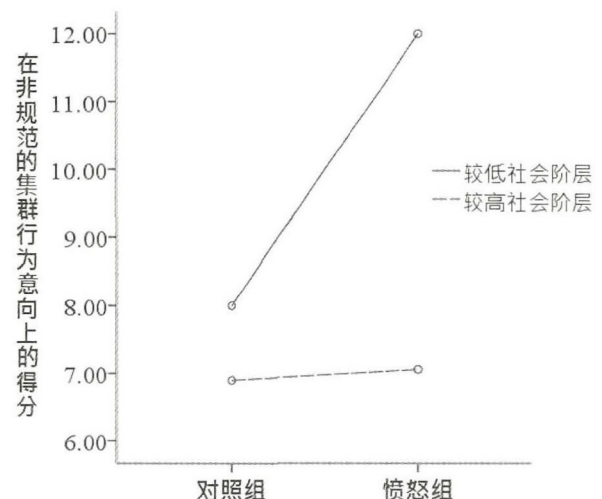


图 2 在非规范的集群行为上的交互作用示意图

### 4 讨论

本文基于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考察高低社会阶层参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差异，假设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类型会影响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研究结果支持了预期的假设：群体愤怒对集群行为的影响要考虑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的方式，对于较高社会阶层而言，群体愤怒情绪影响他们采取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支持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假设；对于较低社会阶层而言，群体愤怒提高他们采取非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符合相对剥夺理论的观点。该研究结果在理论层面上有重要的贡献，即为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在实践层面上，对于人们了解社会阶层参与集群行



为的规律具有重要的启示,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阶层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

首先,对较高社会阶层者,群体愤怒能够正向预测他们采取规范集群行为的意向,这与以往的大量研究结论相一致(殷融,张菲菲,王元元,臧日霞,2017; Leonard, Moons, Mackie, & Smith, 2011),而对较低社会阶层者,群体愤怒未能预测他们采取规范集群行为的意向。这一结果支持了资源动员理论的假设,即人们是否参与集群行为,会考虑自身能够发动的资源或行动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当他们不认为这些行为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时,他们不会采取行动(Becker et al, 2017)。其次,群体愤怒能够正向预测较低社会阶层者采取非规范集群行为的意向,而群体愤怒对较高社会阶层者的非规范的集群行为意向的预测并不显著。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如低社会阶层的群体更可能会采取破坏性竞争行为(Halevy, Chou, Cohen, & Bornstein, 2010)或者是抵抗行为(Schmitt, Maes, & Widaman, 2010)等,支持了相对剥夺理论的假设。与高社会阶层相比,低社会阶层处于一种相对剥夺的状态(Greitemeyer & Sagioglou, 2016),同时,低社会阶层可以动员的资源较少(郭永玉,杨沈龙,胡小勇,李静,2015),当群体效能较低时,群体更可能采取极端的集群行为(Tausch et al., 2011),因而,低社会阶层者更可能采取非规范的集群行为去解决问题。总的来说,该研究的结果表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体偏好采用不同的集群行为去解决问题,启示社会管理者要在注意合理疏导民众负面情绪的同时,还要注意区分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以及不同类型的集群行为,妥善做出回应。

本研究基于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首次将社会阶层这一重要因素引进集群行为研究领域,直接关注了社会阶层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发现了群体愤怒影响集群行为的边界条件,为哪一群体更多参与集群行为的争议提供了实证数据的支持。此外,本研究还同时考察了集群行为类型对不同社会阶层集群行为意向的影响,进一步细化了集群行为领域的研究。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了群体愤怒与社会阶层对集群行为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尽管本研究并未直接关注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但社会阶层的概念本质上即群体所拥有的资源,而以往研究也表明,社会阶层与效能感存在正相关(Barbareschi, Sanderman, Kempen, & Ranchor,

2008),因此,也可推测双路径模型中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可能存在交互作用,未来研究可直接检验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对集群行为的交互作用,对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做出更为直接的检验,丰富和完善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深入理解集群行为发生的微观心理机制。

本研究直接考察了社会阶层与集群行为的关系问题,促进了对高低社会阶层者参与集群行为问题的了解。但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操纵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得出社会阶层与集群行为之间的理论关系,而并非选取完全代表整个社会中存在的不同阶层,从本研究所得出的阶层高低的集群行为差异的结论推广时需要慎重,未来研究可考虑选取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样本,在真实情境中进一步验证高低阶层与集群行为之间的关系;其次,本研究的对集群行为类型的划分,只是基于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做了区分,而由于国情和社会制度等差异,学界目前仍没有统一使用的区分两种集群行为类型的标准,因此,本研究所得结论的推广需要慎重,未来研究需要考虑制定出适用于不同社会中的区分标准,考虑不同社会文化下的集群行为(van Zomeren & Louis, 2017)。另外,本研究基于集群行为的双路径模型,从现象层面上探讨了不同社会阶层在采取集群行为上存在的差异,而为何存在这种差异,本研究未能解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不同社会阶层在集群行为上存在差异的原因,深入探究不同阶层参与集群行为的心理机制,完善和发展集群行为的整合模型。

## 5 结论

(1) 群体愤怒能够正向预测集群行为的意向,群体愤怒越高,参与集群行为的意向也就越高。

(2) 社会阶层和集群行为类型调节群体愤怒与集群行为意向的关系,在产生愤怒情绪时,自身的社会阶层越高,采用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就越高,而自身的社会阶层越低,采用非规范的集群行为的意向就越高。

## 参考文献

- 郭永玉,杨沈龙,李静,胡小勇.(2015). 社会阶层心理学视角下的公平研究. *心理科学进展*, 23, 1299-1311.
- 胡小勇,李静,芦学璋,郭永玉.(2014). 社会阶层的心理学研究:社会认知视角. *心理科学*, 37, 1509-1517.
- 孙静.(2013). *群体性事件的情感社会学分析*.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殷融,张菲菲.(2015). 不同类型集群行为的差异比较. *心理科学进展*, 23,

- 120-131.
- 殷融, 张菲菲, 王元元, 臧日霞. (2017). 当抗议遭遇挫折: 集体行动失利情境下情绪反应对行动意愿的作用. *心理学报*, 49, 482-499.
-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 跨情境下集群行为的动因机制. *心理学报*, 44, 524-545.
- 张书维. (2013). 群际威胁与集群行为意向: 群体性事件的双路径模型. *心理学报*, 45, 1410-1430.
- Barbareschi, G., Sanderman, R., Kempen, G. I., & Ranchor, A. V. (2008).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olde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353-361.
- Becker, J. C., Kraus, M. W., & Rheinschmidt-Same, M. (2017). Cultural expressions of social clas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roup-related beliefs and behaviors.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3, 158-174.
- Bullock, H. E. (2017). Social class and policy pre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interclass rela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141-146.
- Fritsche, I., Moya, M., Bukowski, M., Jugert, P., Lemus, S., Decker, O., et al. (2017).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group-based control: Converting personal helplessness into social class in-group trust and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73, 117-137.
- Greitemeyer, T., & Sagioglou, C. (2016).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causes aggression: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social depr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1, 178-194.
- Halevy, N., Chou, E. Y., Cohen, T. R., & Bornstein, G. (2010).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intergroup competition.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3, 685-700.
- Kraus, M. W., Côté, S., & Keltner, D. (2010). Social class, contextualism, and empathic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716-1723.
- Kraus, M. W., Piff, P. K., Mendoza-Denton, R., Rheinschmidt, M. L., & Keltner, D. (2012).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119, 546-572.
- Kraus, M. W., Tan, J. J., & Tannenbaum, M. B. (2013).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4, 81-96.
- Leonard, D. J., Moons, W. G., Mackie, D. M., & Smith, E. R. (2011). "We're mad as hell and we're not going to take it anymore": Anger self-stereotyping and collective action.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4, 99-111.
- McCarthy, J. D., & Zald, M. N.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1212-1241.
- Paulsen, R. (1991). Education, social class, an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4, 96-110.
- Piff, P. K., & Robinson, A. R. (2017).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Current evidence, caveats, and quest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8, 6-10.
- Scheepers, D., Spears, R., Doosje, B., & Manstead, A. S. R. (2006). Diversity in in-group bias: Structural factors, situational features, and social func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90, 944-960.
- Schmitt, M., Maes, J., & Widaman, K. (2010). Longitudinal effects of egoistic and fraternal relative deprivation on well-being and prot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45, 122-130.
- Shepherd, L., Spears, R., & Manstead, A. S. (2013). 'This will bring shame on our nation':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group-based emo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9, 42-57.
- Shi, J., Hao, Z., Saeri, A. K., & Cui, L. (2014). The dual-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Impacts of types of collective action and social identity.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8, 45-65.
- Smith, H. J., & Huo, Y. J. (2014). Relative Deprivation: How subjective experiences of inequality influence social behavior and health. *Health and Well-Being*, 1, 231-238.
- Tausch, N., & Becker, J. C. (2013). 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action intentions: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protests in Germany.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 525-542.
- Tausch, N., Becker, J. C., Spears, R., Christ, O., Saab, R., Singh, P., & Siddiqui, R. N. (2011). Explaining radical group behavior: Developing emotion and efficacy routes to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129-148.
- van Zomeren, M., & Louis, W. R. (2017). Culture meets collective action: Exciting synergies and some lessons to learn for the future.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20, 277-284.
- van Zomeren, M., Postmes, T., & Spears, R. (2012). On conviction's collective consequences: Integrating moral conviction with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 52-71.
- van Zomeren, M., Spears, R., Fischer, A. H., & Leach, C. W. (2004). Put your money where your mouth is! Explaining collective action tendencies through group-based anger and group effic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7, 649-664.
- Wright, S. C., Taylor, D. M., & Moghaddam, F. M. (1990). 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 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8, 994-1003.

# Social Class, Group-Based Anger, and Their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Li Kai<sup>1</sup>, Xu Yan<sup>2</sup>, Yang Shenlong<sup>3</sup>, Guo Yongyu<sup>1</sup>

(<sup>1</sup>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sup>2</sup>City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9)

(<sup>3</sup>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lation between group-based anger,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in China. Collective action refers to the conflicts aimed at challenging group-based discrimination or group disadvantage. Previous research on collective action found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lower and upper social classes when they experience anger, but the rela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s far from being fully understood. According to the dual 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group-based anger, social class and group efficacy have significant predictive effect on collective action, thus, due to their lack of available resources, the lower social class has low group efficacy, but they experience more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may participate in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While the upper class is the opposite, compared with their peers from lower class, they have higher group efficacy, once they are treated unfairly and feel anger, they will take part in 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 order to test the hypotheses, we examined the possible influences of differential collective action types and social classes. 130 participants ( $M_{age} = 27.30$ ,  $SD = 5.82$ ; 47.7% male) were recruited and randomly assigned to a 2 (level of social class: upper vs. lower)  $\times$  2 (level of group-based anger: high anger vs. the control)  $\times$  2 (collective action types: 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vs. nonnormative collection action) group. First, we manipulated social class and group-based anger of participants. Then, every participant was asked to complete the scale measuring their normative and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Next, independent samples t-test was used to test the validity of the manipulations, and it showed that the manipulations were successful.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was used to test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class, group-based anger and collective action types. The results were supportive of predictions and indicated tha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high group-based anger increased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of both upper social class and lower social class, and 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of upper social class ( $M = 12.03$ ,  $SD = 5.47$ ) was higher than lower social class ( $M = 7.13$ ,  $SD = 1.33$ ),  $F(1, 126) = 40.31$ ,  $p < .001$ , while nonnormative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 of the lower social class ( $M = 12.00$ ,  $SD = 5.32$ ) was higher than upper social class ( $M = 8.00$ ,  $SD = 3.86$ ),  $F(1, 126) = 40.31$ ,  $p < .001$ .

Taking together, the present study expanded existing works about social cla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and found that individuals' social class influenced their way of collective action. Specifically, upper social class would participate in normative action to safeguard their rights and interests, whereas lower social class would participate in nonnormative action when they were treated unfairly. Consistent with previous studies about collective action (Tausch, Spears, Saab, Becker, Christ, & Singh, 2011), group efficacy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normative action and negatively related to nonnormative action. In sum, this research identifies a behavior tendency between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and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relation of social class and collective action.

**Key words** social class, group-based anger, collective action intention